

史和现实的教训,鉴于我们理性的启示,我们要推进的是那种尽量避免自然代价,同时也是避免社会代价的转型过程。

3 成功控制“非典”显示了社会转型的良好基础

自4月以来,控制非典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机体还是比较健康的,这种相对健康的社会机体是继续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的、有效的基础。

具体地说,继续推进社会转型的良好基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力、有效的;(2)各级政府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革除了一些惯习,提高了行政效率,意识到了加强弱势群体保护和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扩大了国际协作;(3)广大民众对于政府是信任和支持的。有关调查表明,当政府转变以前那种“信息封锁,内部运作”的危机处理模式,而改成“信息公开,开放运作”的危机处理模式后,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对于政府信息、政府行为的高度信任,政府的很多政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配合与支持,如果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不协调,抗击非典的战役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胜利的;(4)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民族精神再一次得到体现。这种凝聚力,这种精神,曾经使中华民族成功地应对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并再次成为抗击非典的重要资源,它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复兴的最大希望;(5)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为缓和危机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我们抗击非典的战役就缺乏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其结局也将是不可想象的。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我们这个社会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也就很弱,很难谈得上顺利实现社会转型。

综上所述,“非典”事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促进了我们的深入反思,但同时也检验了我们这个社会。整体上讲,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健康的,有着很好的活力和基础结构,在这种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型的、全面的、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是充满希望的。

从防治“非典”看中国社会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2003年4月和5月期间影响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在5月上旬,全国每天的感染病例近百人,到6月累计病死340多人,在此期间北京和各个省份、各大城市都把“非典”的防治工作列为首要工作。不仅取消了“五一”的长假,原定各项大型会议被迫延期,而且许多学校的课程、企业的生产都根据防治“非典”的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中,有关“非典”防治的报导与节目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在2003年4~5月份,“非典”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造成重要影响的一件头等大事,防治“非典”成为全国城乡人民生活与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最后终于取得了战胜“非典”战役的初步胜利。

从最近防治“非典”的一系列事态发展来看,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能够使我们对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有些什么思考呢?从前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我想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

第一,“非典”的防治工作可以说是对我国政府,特别是新一届政府组织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考验,在国内外媒体大量有关“非典”信息和民间谣传的集中“轰炸”之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北京保持了稳定,除了部分年轻学生和外地打工人员有些浮躁之外,各行各业、各个部门机构仍然按部就班地保持日常工作、布置“非典”防治,令行禁止,井然有序,而且各项工作在这个特别时期实施得很有效率,如小汤山医院在7天内建成,使国内外对我国政府的工作效率刮目相看。这说明了在推行“改革开放”20多年后,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之后,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社会动员力量依然很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依然很强。不能小看了这一点,这对于增强政府和民众今后继续推动社会深入改

革进程的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外国政治家也非常关注我国政府的权威性与工作效率,这对新一届政府今后开展的外交工作,也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根据北京市在防治“非典”有关的一些工作中的失误,中央果断地撤换了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两个高级负责人,这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件事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即“工作失职”或“工作失误”可以让高级官员丢掉“乌纱帽”。

建国几十年来,党政官员中因为政治上“站错队”可以丢官,因为经济上贪污受贿、触犯法律可以丢官,但因为“工作失职”而丢官的高级官员人数极少,至多不过是“易地为官”,而广大民众对于干部不满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问题,每年因各级官员工作失职和失误而造成的国家财产的巨大浪费、国家资源的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何止以百亿计算?!现在各级官员“报喜不报忧”,隐瞒事实以“维护”政绩、回避责任,这在我国政府各部门是常见的现象,结果许多问题在初期没有得到纠正,得以继续发展,往往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官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单举因为没有按照中央政策关闭不符合规划要求、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小煤窑这一项,国家损失的煤炭资源、矿工失去的宝贵生命就不知应如何计量。有关的中央文件早就发到了每一级政府,但没有听说发生严重事故后哪位分管的省长丢了官。在县一级的机构出了事,省一级、部一级的主管官员就不应当承担督察不严、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的责任吗?

不仅在西方国家,在日本、韩国也经常有高级官员因所属部门的下级人员出现工作失误(尽管高级官员本人没有直接责任)而引咎辞职的事。如果从这次“非典”开始,工作出现失职或失误将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而主管官员也有了承担责任的意思,这对中国的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应当说是一件大好事。

第三,在“非典”防治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我国关于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机构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北京既没有专门的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机构,也没有足够的传染病隔离病床,在广东出现疫情后,其他各省区和国家中央一级的传染病防治机构似乎也没有及时动作起来,疫情信息不沟通,防治经验不交流,这就暴露了我国对于处理重大疫情时的应变机制不够健全,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全国性防治系统。

虽然全世界都呼吁消灭大杀伤性武器,美英甚至以此为理由进攻并占领了伊拉克,但是众所周知,还有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甚至在继续研制生化武器,而且看来也没有什么力量去制约它们。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万一自己成为生化武器袭击对象时,我们的防御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变,以防未来的生化战的攻击和讹诈。我觉得有关部门可以把这次的“非典”视为一次应对外敌对中国进行生化武器袭击的“准”演习。我相信国家是有这样的应对体系和应对战略的,防生化战的系统与防治传染病的系统应当是一体的或者至少是部分重合的,这些机构应当在这次防治“非典”的过程中以及过程之后仔细地总结一下经验与教训,检讨在侦查和及时发现疫情、总结分析有关信息、信息传递与中央决策、应对程序与效率、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等每个环节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中现存的缺陷与弱点,在以后应加以改善提高,这对于亿万国民来说,未尝不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四,为了及时有效地防治“非典”,国家紧急拨款几十亿来支付在防治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费用,这对于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预算外的负担。这件事反映了国家对国民负责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近年来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步伐偏慢的现实。假如中国现在已经建成了美国那样的医疗保险体系,“非典”患者的诊治费用中有很大部分就将由医疗保险来支付了,国家只需要拨款支持预防性的公共支出、补助受到重大冲击需要扶植的一些特殊行业、支持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制等项。

这次“非典”疫情的扩散范围还控制在几个大城市,如果一旦扩散到广大农村地区,以现在农村的医疗条件和农民的卫生习惯来看,那将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前景,所需要的防治费用应当是天文数字。据我们在一些地区的调查中了解,基层的医疗卫生系统非常薄弱,有的地区已经完全瘫痪,农民小病自己硬抗、大病送城市就医,治病负担成为农民贫困的一大原因。所以国家应当加快城市与农村的医

疗体制改革步伐,早日建成完善的城乡医疗保险体系,这不仅造福民众,也使政府在出现例如防治“非典”这样的非常事件时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五,近年来中央为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具体的内容里有很大的部分是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投资于公路、桥梁、通讯、能源、水利等方面,仅2001年和2002年国家就在西部为这几个方面投资3000多亿元。但是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修了路之后对于促进当地的经济作用有限,一年也没有几吨货物可运,而且维护费用极高,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确实是严重的浪费,而且有些地方修了公路后反而为盗伐林木、盗猎珍稀野生动物、盗采矿藏者提供了方便,造成当地生态、矿藏和野生动物资源的严重破坏。所以在审批项目时需要特别严格,要聘请各个方面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学者专家进行评估。

其实,加强农村和西部地区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建设,同样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西部几个省区有几百个县,上亿人口,在这几百个县里,县级、乡镇级医院和中小学的建设包括土建工程、车辆、各类设备、电力供应等的总投资应当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其效果绝对是造福民众、造福子孙、功德无量,为什么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医疗与教育方面的投资兴趣不太高呢?可能是因为每个医院、每所学校的投资额都不够大,上不了报纸头条,请不到中央负责人来剪彩,作为主要官员的“政绩”来说显得很零碎、给人印象不深刻。但是,如果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提倡,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还是可以调动起来的。

政府是必须对人民负责的,“三个代表”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像医疗与教育事业,如果平时舍不得投资,一旦爆发了“非典”这样的事,钱是一点儿也省不下来的,而且还会落下群众的抱怨。“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希望这次防治“非典”的工作与开支,可以让我们的领导人把在基层医疗和教育条件的改善提高也当作“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家财政的宝贵资金、把通过“国债”形式筹集到的国民资金用到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放到站在全国性长远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地方。教育培养人才,医疗保障健康,未来国际上的竞争主要是人才与健康的竞争。中国人已经永远告别了“东亚病夫”的称号,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让中国的教育和医疗水平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这才是国家之福、民族之本。多修几条路、建几座桥,不过是多几项土木工程而已。

第六,中国自80年代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民众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住房饮食交通的条件普遍改善了,物资丰富了,个人存款增加了。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全面提高了呢?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人们的个人卫生习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重视室内卫生、不顾公共场所)、社会的卫生医疗设施(通风隔离条件、医疗设施)、社会的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购物、文化娱乐场所的卫生条件)等方面虽有改善,但与我国民众经济收入提高的幅度并不同步。有些人的消费带有“暴发户”的特征,因为在人的基本文化素养、社会公德水准等方面,近20年来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对于一种恶性传染病的有效防治,需要社会全体国民的高素质、纪律性和公德心,需要民众对于各项防治措施的理解与配合,需要民众对于其他生命的真正关爱。在“非典”流行期间,有些学生和其他人员不顾政府、学校的纪律与安排,盲目流动,实际上为自身、他人和社会都带来了更大的危险,有些人甚至黑了心去造假消毒液和伪劣口罩,发“非典”财。在“非典”防治工作结束之后,相信许多人会反思在这一过程当中自己与他人的各种行为,这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无疑会有所促进。

第七,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服务行业(旅游、餐饮、旅店、客运交通等)在规模上急剧扩大,但在“素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部分旅游点的基础设施在“硬件”上仍然比较简陋,而整体队伍的“软件”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有些服务机构的职业公德与人员素质反而有下降的趋势。经营单位以赢利为目的,这并没有错,但是应当在基础设施、卫生条件等方面切实保证各方面服务的质量,要对顾客负责,要让顾客满意,发展旅游业最重要的是声誉,要有长远的眼光。这次“非典”防治工作一方面暴露出这些部门和机构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上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政府有关部门在管理监督方面也有很多漏洞。这次“非典”袭击对这些部门冲击很大,如果能够及时反思总结,制定全面提高这些行业基础设施的标准与规划,制定改善对这些部门的管理监督的条例与办法,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防治“非典”是全国性的大事,各行各业都在关注这项战役的发展,因为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突发性事件,民众也在观察政府的应对措施和工作效果,作为社会学这个专业来说,也是一个对于社会动员和组织效率、大众心理、民众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评价、媒体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的时机。有一些平时不显著的社会现象,可能在目前的非常条件下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一些人们平时不大思考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事件的冲突下可能会比较认真地思考。我想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应当抓住这个时机,设计一些调查项目,及时实施,为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国社会、认识“非常态”状况下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应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人能够战胜“非典”,能够在—个时期内使中国建设成为—贯真正发达文明的国家。防治“非典”战役虽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我希望能够借这个契机,把坏事变成好事,推动我们去思考—些问题,在战胜“非典”之后把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突发公共事件与社会控制:由 SARS 引发的反思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

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1 问题

SARS 的爆发和流行,已经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反思。SARS 表现为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我们在考虑它的“卫生事件”特征时,不应该忽视更重要的特征——“突发公共事件”,这次是公共“卫生”事件,下次可能是公共政治事件、自然灾害事件、生活事件(突发大规模停水、停电、交通断绝),以及其他突发性的危及整个社会的事件。因此,我们的反思应该以 SARS 为基础,将反思置于—个更为广泛和深层的基础之上。

就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来说,其本质是“控制”,即控制事件传播、社会混乱、社会恐慌、连锁危机等。而公共性突发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和公共性,特别是公共性,使得控制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因此,问题便变为国家如何反应、决策、控制突发性公共事件。SARS 如此,其他事件也如此。在—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常态性的事件需要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突发性的事件更需要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

如果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去考虑突发性公共事件,—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类似的公共事件在改革开放前也出现过,但为什么没有引起如此的失控和严重的后果,例如,SARS 流行和爆发的早期或前期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般来说,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取决于两个机制:其一,共享价值观;其二,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规范。它们的功能在—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二者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对人们基本社会关系和利益的调整上,因而它们的功能以及派生的其他手段取决于基本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环境。

从这样—个角度去反思 SARS 事件,如果承认在抗击 SARS 的过程中存在—系列程度不同的“失控”问题的话,问题可进一步表述为国家或社会控制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般来说,社会控制的过程实质上即是对社会各个部分和社会成员进行协调和规范的过程。因此,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于上述问题可以给出的—个回答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共享价值观的变化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但这里不做讨论)。面对发生在变革了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传统的认识、机制和手段,其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新的事件的挑战。20 多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不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状况,